

汪亭友 著

CLINGONG DE
HONGQI
HUIDI

克里姆林宫的 红旗因何坠地

苏联演变的根源探究

当代世界出版社

克里姆林宫的红旗因何坠地

——苏联演变的根源探究

汪亭友 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克里姆林宫的红旗因何坠地：苏联演变的根源探究 /
汪亭友著 . -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5

ISBN 7 - 80115 - 754 - 0

I . 克… II . 汪… III . 和平演变 - 研究 - 苏联
IV . D75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0104 号

书 名：克里姆林宫的红旗因何坠地

Kelimulingong De Hongqi Yinhe Zhuidi

出版发行：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北京复兴路 4 号 (100860)

网 址：<http://www.worldpress.com.cn>

编务电话：(010) 83908403

发行电话：(010) 83908410 (传真)

(010) 83908408

(010) 83908409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才智印刷厂

开 本：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10.5

字 数：260 千字

版 次：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 ~ 2000 册

书 号：ISBN 7 - 80115 - 754 - 0/D · 185

定 价：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研究苏联演变的几个方法论问题（代序）

周新城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政局发生剧变，苏维埃政权遭到颠覆，社会制度由社会主义演变成为资本主义，最后以苏共遭禁止，苏联被解体这一悲惨结局而告终。这一事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大的悲剧，它使得世界社会主义事业跌入低谷，也使得国际格局发生深刻变化。这样一个影响十分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一度成为世界舆论的中心话题，而且至今议论纷纷，这是不足为奇的。围绕着苏联演变的性质和原因，学术界发表了大量的论著，看法是五花八门的，分歧甚大。汪亭友博士的专著《苏联演变的根源探究》就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并对一些有争议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此书稿即将付梓之际，他委托我作个序言。在这里，我想就研究苏联演变的几个方法论问题谈一点看法，权且代序。

一、苏联演变与苏联解体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问题

现在，学术界对这一段历史主要的提法往往是苏联解体问题，而不大提苏联演变问题。其实，苏联解体与苏联演变是不同性质的问题：前者是国家组织形式的变化，即由统一的国家联盟变为一个个独立的共和国，其中一些共和国重新联结成为松散的联合体——独联体；后者是社会制度的变化，即由社会主义制度演变成为资本主义制度。毫无疑问，这两件事情是在同一个历史

过程中实现的，在时间上是一致的，苏联解体过程同时也是苏联演变过程，苏联的解体、联盟的解散实际上标志着苏联演变过程的完成，但两件事情的内容却是不一样的。我们认为，重点应该研究苏联演变问题，因为社会制度的变化是本质的、根本的，而国家形式的变化只是社会制度演变的后果。如果共产党仍掌握政权，社会制度仍保持社会主义性质，苏联即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不大可能遭到肢解的。改革会在联盟范围内进行，而不会去解散联盟。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共产党领导地位被推翻，甚至本身被解散，社会主义制度被资本主义制度所取代。联盟解体，表面上看来，是民族矛盾和冲突的结果，然而这种矛盾和冲突的背后是激烈的阶级斗争，是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夺取政权的斗争。所以，研究这一段历史，注意力应该主要放在探讨苏联演变的问题上。

二、必须把苏联社会主义时期与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向资本主义演变的时期区分开来

从十月革命胜利到 1985 年 3 月戈尔巴乔夫上台这 68 年时间，是苏联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期，那时社会制度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戈尔巴乔夫上台，是苏联发展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因为他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意味着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转到了反马克思主义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分子手里，他在各个领域贯彻执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社会制度逐渐由社会主义演变为资本主义。戈尔巴乔夫当政的 6 年多时间（从 1985 年 3 月到 1991 年 12 月）已经不能算是社会主义时期了，而是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演变的过渡时期。这一点，戈尔巴乔夫是直认不讳的，不过他把这一时期称之为“革命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政局动荡、经济凋敝、社会不稳、民怨沸腾这种苏联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局面，是戈尔巴乔夫背离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基

本原则，全面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所造成的，是不搞社会主义造成的。苏联演变指的就是这一时期发生的事情。因此，研究苏联演变问题，重点应该放在这一时期。必须详细占有苏联演变过程的第一手材料，从中找出带规律性的联系，得出必要的结论。当然，谈到苏联演变的历史因素，也要涉及社会主义时期的问题。不要把两个时期的问题混淆在一起，更不要把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出现的问题算在社会主义的账上。尽管这两个时期有着历史的联系，但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两个时期。

三、研究苏联演变问题，首要的是要有一个正确的立场

苏联演变的实质是从社会主义制度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如何评价苏联的演变，首先碰到一个问题：从总体上讲是肯定的评价还是否定的评价，通俗地说，是好事还是坏事？这是回避不了的。这里，就有一个价值判断：什么叫“好”、什么叫“坏”，究竟是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这种价值判断，不同的阶级是截然相反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某一种人，一定只有这一种人的思想和眼光，不能越出他本阶级之外。说起来，好像又在提倡什么犯讳的阶级了，然而事实是如此的。”如果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必然赞扬苏联演变。在他们看来，十月革命以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历史的迷误”、“选择的失误”，资本主义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苏联演变“回到了人类文明的正道”，是一件大好事。苏联演变受到了西方国家政治家、思想家一致的欢呼，他们为此弹冠相庆，这是由他们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所决定的。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必然对苏联演变痛心扼腕，因为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前途所在。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由社会主义制度演变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历史的倒退。虽然它改变不了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性，但终究是历史发展的重大曲

折。苏联演变关系到各个阶级的根本利益，因而他们对此作出不同的评价是可以理解的。

我国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我们来说，按照常理，对苏联演变这一历史事件的价值判断应该是十分明确的：我们认为这是一件坏事，因为我们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化。当然，正确总结苏联演变的教训，把它作为前车之鉴，坏事也可以变为好事，但它本身仍是一件坏事。遗憾的是，恰恰在我国学术界有一些人极力颂扬苏联的演变，说它是“历史的进步”，是“一种解脱”。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尽管取得巨大成就，却被他们说得一无是处；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的俄罗斯，尽管经济大幅度下降，人民生活严重恶化，却被他们轻描淡写地以“长痛不如短痛”一笔带过，而且十分乐观地断定，从此将一帆风顺，未来肯定是很美好的。他们固守着这样一种看法：搞社会主义肯定不好，好也不好；搞资本主义肯定是好的，不好也是好。有了这样的偏见，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了。“立场错了，一切皆错”，这是颠扑不破的道理。

四、决不能说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是“人民的选择”

有人以苏联演变过程中，曾经有几千万人次的反共游行、集会、罢工等活动，而在“8·19”事件后解散苏共时又没有遭到有组织的反抗为根据，证明苏联的演变反映了人民的意愿，是人民的选择。这种判断是错误的。历史上一切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倒退行为，都是反动阶级强加给人民、违背人民群众意志的，苏联的演变也不例外。80年代末、90年代初猖獗一时、肆无忌惮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是在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公开性方针的支持和纵容下，敌对势力通过蛊惑性欺骗宣传煽动起来的。这类活动表面上声势不小，但骨干人数却不多，大多数群众是不赞成的。至于说到解散苏共时没有什么有组织的反抗，这并不能证明

广大党员拥护解散，而恰恰证明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恶果，按照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改造党，使得共产党改变了性质，思想混乱，组织涣散，已经处于不攻自垮的状态，因而不可能有组织地反抗解散苏共的决定。事实上，苏联的演变不符合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复辟资本主义的行为以及解散苏联的决定并没有得到人民的授权。1991年3月17日苏联曾就“是否赞成保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一问题进行全民公决，结果是，参加投票者76%的人赞同保持苏联，但此后仅9个月时间，叶利钦等人就强行解散苏联，这难道是“人民的选择”？显然，这是反人民的。我们再举一个例子。1990年前后，为了研究苏联改革的走向，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许多民意测验机构在苏联进行了多次民意测验，结果表明：支持实行资本主义的人在5%—20%之间，而高达80%的人都希望坚持社会主义。1991年5月（即苏联解体前7个月），美国一个民意测验机构在苏联进行了一次1000人规模的民意测验，其中一项内容是：“你是否赞成在苏联实行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只有17%的人表示同意，83%的人表示不赞成。由此可见，苏联公众的大多数并不想取消社会主义而建立资本主义。如果让苏联人民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愿，他们是决不会选择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直到2001年12月8日，也就是解散苏联的《别洛韦日协议》签订10周年之时，俄罗斯就解散苏联一事举行的民意测验显示，多数俄罗斯人（72%）对苏联解体感到遗憾，只有10.4%的人赞同解散苏联，13.4%的人对此漠不关心，其他人认为难以回答。可见，苏联演变和解体并不反映人民的愿望，不是人民的选择。

五、研究苏联演变问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

对于像苏联演变这样重大而又复杂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事件，应该怎样分析呢？早在1914年，列宁就对分析复杂的政治

事件谈到一个方法论性质的意见，他说：“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只有研究某一社会或某几个社会的全体成员的意向的总和，才能科学地确定这些意向的结果。其所以有各种矛盾的意向，是因为每个社会所分成的各阶级的地位和生活条件不同。”^① 历史的发展是各种社会力量的合力推动的，为了说明历史的发展，就必须分析“社会关系以及从一个阶级到另一阶级、从过去到将来的许多过渡阶段的复杂情景”。他再三告诫说：“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离开分析阶级关系的正确主场”。^②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始终是我们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同一切敌对势力斗争的复杂政治现象的一把钥匙，研究苏联演变这样重大的政治事件，必须牢牢记住这一点。如果用阶级斗争观点来看待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的苏联问题，那么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苏联演变是一场两个阶级、两种社会制度的激烈斗争，斗争的核心是政权问题。苏联演变的实质是，敌对势力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共产党内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分子的配合下，三股政治势力沆瀣一气，夺取了无产阶级的政权，推翻了社会主义制度，复辟了资本主义。无论你怎样评价苏联演变，说它是“历史的进步”也好，是“历史的反动”也好，都不能否认这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尽管采取的是“和平”的形式，但丝毫没有减弱其激烈的程度。

对作为一场阶级斗争的苏联演变问题，可以作历史的分析，也可以作逻辑的分析。历史的分析，就是把苏联演变过程，即从 1985 年 3 月到 1991 年 12 月这一时期，按历史的顺序分阶段进行研究。这样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斗争双方力量是如何消涨，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逻辑的分析，就是探索苏联演变过程的

① 《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426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29 卷，第 136 页。

内在的规律性联系。我认为，大致上是这样的三步：第一步，敌对势力和党内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分子相互配合，全盘否定和攻击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实践，制造反共反社会主义舆论，做反革命的意识形态工作，搞乱了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的思想，动摇了他们对党的信任和对社会主义的信念；第二步，敌对势力在搞乱思想的基础上，瓦解党的组织，制造动乱，乘乱一步一步夺取政权（先是夺取地方政权，然后再夺取全国政权），而共产党在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步步退让，拱手让权，最后酿成无产阶级政权被颠覆，共产党被解散、苏联被肢解这种亡党亡国的悲惨结局；第三步，资产阶级政治势力利用已夺取的政权的力量，推行私有化，恢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奠定经济基础。这样的“三部曲”，是苏联由社会主义和平演变成资本主义的带规律性的过程。

六、研究苏联演变问题必须运用唯物主义方法，从实际情况出发

苏联演变是一个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历史事件，其中有国际的因素，也有国内的因素；有党外的因素，也有党内的因素；有历史的因素，也有现实的因素；有政治的因素，也有经济的、社会的、民族的因素。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事件，要作出科学的分析，必须有正确的方法。从一些讨论会的发言、报刊发表的文章中经常看到这样一种倾向：我国在强调什么工作、抓什么问题，有人说苏联的演变正是由于这项工作没有做好，或者正是由于出了这个问题才造成的。例如，我们强调发展经济是首要任务，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说苏联的演变是因为经济没有搞好；我们提出“要警惕右、但主要防止‘左’”，就说苏联是“左”葬送了社会主义；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说苏联是因为没有搞市场经济才垮台的；

我们抓反腐败，就说苏联是因为腐败、以权谋私而瓦解的；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马上就有人说苏联之所以垮台，就是因为没有提出和实践“三个代表”；如此等等。这样的研究方法，貌似联系实际、总结教训，实际上是把科学研究庸俗化、实用主义化了。事先有了一个结论，而这个结论不是从苏联演变过程的实际材料中总结出来的，而是从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得出来的，然后随便找一点苏联的材料来加以论证。这种方法会把苏联演变这样一个严肃课题的研究工作引上邪路，也不可能真正总结出教训来。

列宁曾经指出：“社会科学的惟一科学的方法，即唯物主义的方法。”^① 唯物主义就是要从客观存在的实际出发。原则不是研究问题的出发点，而是对实际材料进行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正如毛泽东对实事求是所作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② 我们必须从苏联演变的实际情况出发，找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内在联系。决不能从某种既定的原则出发来剪裁苏联演变的材料，更不能用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来对苏联演变的原因进行简单的推理。正确的方法应该是，详细占有苏联演变过程的第一手材料，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分析，从中得出带有规律性的结论。

从实际材料出发，必须注意尽可能全面地了解苏联演变的整个过程，尤其要把握这一过程的基本事实，而不能抓住个别事例就下结论。苏联演变是一个多因素促成的复杂的历史过程，切忌不作全面研究，引用某一方面的、甚至某几个材料就作出论断。列宁曾经告诫我们：“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

① 《列宁全集》第1卷，第18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

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们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都不如。”^①因此，我们在研究苏联演变问题时，必须从事实的总和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中去把握苏联演变的过程。

研究苏联演变问题的另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是必须抓主要矛盾。苏联演变是多种矛盾综合起作用所造成的，然而这些矛盾在整个事件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一样的，如果不分主次去研究像苏联演变这样复杂的事件，势必如堕烟海，不知从何着手，或者只能停留在对现象的罗列和描述上，而不能把握事情的内在联系和本质。因此，应该从在苏联演变过程中起作用的各种矛盾中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抓住主要矛盾，就抓住了整个事件的纲，进而“纲举目张”，就可以把事件的各个环节作为一个系统研究清楚。这是毛泽东同志教给我们的方法。他说：“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②我们必须运用这一方法来研究苏联演变问题。

① 《列宁全集》第23卷，第29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0、322页。

七、正确评价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是研究苏联演变问题的前提

苏联演变问题研究工作中观点的分歧往往是同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评价分不开的。很明显，如果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认为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错误的，社会主义建设一无成就，那么，苏联演变的原因就在于社会主义本身，从而向资本主义演变就是必然的、甚至是进步的；如果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评价是“三七开”，认为成绩和经验是主要的、第一位的，缺点和问题是次要的、第二位的，那么，苏联演变的决定性原因就不应该到社会主义实践中去找，向资本主义演变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处于次要地位的缺点和问题完全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的范围内、依靠社会主义自身的力量加以解决，而不需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清代思想家龚自珍总结历朝更替的教训，提出一个令人振聋发聩的论断：“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史存而国存，史亡而国亡。”这一论断说明了正确对待历史的重要性。苏联演变为这一论断又增添了一个注解。回顾一下苏联演变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敌对势力正是在民主化、公开性的纵容和支持下，全盘否定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实践，把过去的一切工作描述成一团漆黑、一无是处，从而动摇了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信任和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在此基础上进而煽动群众、制造政治动乱，最终夺取政权。所以，如何评价社会主义实践，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是一个关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前途和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

评价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第一，应该采取历史主义态度，即结合具体的环境和条件来评价。有许多事情，例如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等，在当时是必要的、正确

的，但随着条件的变化需要调整和改革。切忌用现在的、已经变化了的条件来评价历史上的事情；第二，应该全面分析，既看到问题，也要看到成绩，而且应该分清主流和支流。必须从整体上考察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切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更不能带着偏见去观察，先有了结论，然后去寻找符合这个结论的材料，而对不符合这个结论的材料视而不见。第三，必须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它的具体实现形式——体制、运行机制区分开来，正确认识缺点和问题的根源。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失误和弊病，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产生的，而是在具体的体制、运作机制环节上出现的，或者是由工作方法、具体政策造成的，因而纠正这些失误和弊病，不需要改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应该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体制和改进工作。切忌笼统地谈论失误和弊病，并把它们引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身上去。

八、必须把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作为人类历史上社会主义理想变为现实的第一个试验来对待

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特别是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矛盾，发现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他们对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设想。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领导俄国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把社会主义理想变成了现实。但十月革命胜利后，他在世的时间太短，只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初步进行了一些实践。完整的、系统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以及制度、体制，是苏联人民在斯大林领导下提出并实施的，其基本框架一直延续到 80 年代中期。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一种探索。由于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只

能根据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提出的一些理论设想，结合苏联的具体情况摸索着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种探索，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挫折和教训，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宝贵的财富，都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丰富的借鉴材料。对前人在探索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和弊病，我们应该采取宽容的态度。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成年人对青年时代犯下的错误、甚至看来是幼稚可笑的错误，不应苛求。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前人进行嘲笑、谴责乃至攻击，这是不足取的。重要的是要总结经验，在前人的基础上纠正错误，继续前进。轻易地把第一个社会主义实验贬之为“失败”，予以否定和咒骂，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郑重的态度。

九、必须把改革的必要性与垮台的必然性区分开来

谈到苏联演变的原因，人们往往提到苏联演变是执政的共产党犯错误的结果。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如果共产党不犯错误，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被颠覆的。然而这样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有时甚至会导致错误的结论。应该看到，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事业，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在实践中进行探索，在探索过程中，犯错误是难免的。

如果笼统地说共产党犯错误就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垮台，那么我们对社会主义就一点也没有信心了。必须具体分析所犯错误的性质。有两类错误。一类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具体工作中犯的错误，这一类错误，哪怕是带有全局性的错误，像我国“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错误，共产党只要有一条正确的路线，完全可以由自己来纠正，并不会改变党和国家的颜色。另一类错误是共产党抛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提出并执行一条错误的资本主义性质的路线，那么推翻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结局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而且是

无可挽回的。苏联演变正是后一类错误造成的。

这两类性质的错误说明的是这样两个不同的问题：前一类错误说明了改革的必要性。改革不是目的，而是解决实际生活中存在的矛盾的一种手段，正因为出现失误和存在弊端，所以必须进行改革；后一类错误则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垮台。试想，执政的共产党自己都不搞社会主义了，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了，在这个国家里，社会主义制度当然就难以继续存在下去了。我国学术界有人经常罗列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失误和弊端（从数量上说，这是很多的，而且孤立来看，有的问题还十分严重），以此作为苏联演变的根本原因，这种看法在方法论上的缺点就是没有区分不同问题的性质：把说明改革必要性的问题当作必然导致垮台的原因了。

十、必须具体分析各种因素在苏联演变过程中的作用

上面讲过，苏联演变是多种因素综合起作用所造成的。为了分析苏联演变的原因，我们应该全面地考察所有有关的因素。但是仅仅停留在罗列这些因素上还是不够的，必须进一步分析每一种因素与苏联演变这种结局是什么样的关系，即要具体分析这种“关系”的性质。要把潜在的可能的关系与必然的因果关系区分开来。有的因素是长期存在的，只是在出现了与演变有必然联系的因素之后，两者相结合，才成为演变的现实因素；有的因素只要一出现，就必然导致向资本主义演变。

在国际国内研究苏联演变问题的著作中，关于苏联演变原因的说法是各种各样的，几乎是一人一种说法。但是，概括起来，无非是三大类因素。第一类是外部因素，即西方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这一类因素不容忽视，美国一些政治家更看重这一因素的作用。但是西方国家在苏联演变过程中的作用终究只是外部的，和平演变战略从 50 年代中期起就搞了，一直没起多大作用，

只是到了 80 年代末才发挥巨大影响。“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因此，决定性的还是国内的因素。第二类是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失误和弊病。列举这一类因素的各种具体表现，往往成为研究苏联演变原因的主要内容，有人把这一类因素中的某些表现称为苏联演变的“深层次原因”，仿佛正是这些失误和弊病是导致苏联演变的根本的、决定性的原因。这是值得探讨的。我们不否认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确犯了很多错误，有的还十分严重，然而这些错误在整个社会主义实践中是支流。这些错误的不良后果引起了人民群众的不满，给敌对势力提供了煽动群众、制造动乱的可乘之机，但它们终究只是演变的一种潜在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能否变为现实，取决于党的路线。如果共产党有一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完全可以通过改革纠正错误，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应该承认，我国由于“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远比苏联 1985 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时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要严重得多，然而我们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贯彻党的基本路线，通过改革开放，不仅克服了困难，而且出现了经济繁荣、政局稳定、社会安定的欣欣向荣景象，使得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堡垒依然屹立在东方。在苏联，80 年代中期存在的矛盾、困难和问题尽管比我国要少得多，程度也轻得多，但由于发生了路线性错误，却出现了向资本主义演变的悲剧。把中国与苏联的情况作一比较，我们可以看到，问题不在于社会主义实践是否有失误和弊病（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难免的），而在于如何对待这些失误和弊病，这里，路线是决定一切的。因此，决不能认为，第二类因素是苏联演变的决定性因素。如何分析这一类因素在苏联演变过程中的作用，是我国学术界研究苏联演变原因问题上分歧的焦点所在。第三类因素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推行一条错误路线——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贯彻这条路线，使得共产党变成资产阶